

“全球地方化”及其悖论:城市空间面临的治理和文化挑战

宋道雷

摘要:全球地方化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融合产生的现象。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全球地方化不同,中国的全球地方化是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为载体的,是全球化、城市化和地方化三者融合的产物。全球地方化一方面可以满足地方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化要素,另一方面又被资本驱动的空间升级进程所捆绑,在慢慢侵蚀其中的地方化和多元化要素。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深化的全球地方化进程正在产生“原真性”悖论,这为城市空间治理和文化生态带来三重挑战:阶层空间集聚挑战、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挑战,以及城市文化审美挑战。从本质上讲,应对这场挑战是为了留住、保持和提升城市个体的归属感,城市空间的生活和文化多样性,城市的灵魂和国家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全球地方化;城市空间治理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0.02.001

全球化与地方化在当今中国的各大城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造就了特有的全球地方化现象。在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感受到全球化、地方化与全球地方化各种混合要素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当我们置身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摩天大楼、星巴克咖啡店、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等都给我们带来全球化的冲击;当走出这些全球化带来的标志化城市空间之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地方化要素,例如鳞次栉比的地方化商品小店、特色饮食餐馆与娱乐休闲场所;同时,我们也会发现那些处于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全球地方化要素,例如酷似苹果产品专卖店的华为手机专卖店、肯德基的老北京鸡肉卷,以及上海的新天地和田子坊代表的融合了传统中国建筑和现代西方商业要素的城市空间等。全球化和地方化时时刻刻都浸润在国家、城市、商街、社区等空间之中,仅仅单独讨论全球化或地方化,都会使任何一方显得缺乏说服力,而无法解释时代和现实赋予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的崭新命题。由此,我们需要关注全球化与地方化融合互动产生的现象,即全球地方化。

一、全球地方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结合

顾名思义,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是 globalization 与 localization 的合体,同时也是 global 与 local 的合体——glocal 的名词形式^①。它虽起源于日本一些地方根据不同地域状况而调整自身耕植技术的耕种策略,即日语 dochakuka,但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术语已经成为指向企业全球化产品根据不同地域的特殊性,创造出既具有全球化的一般特征,同时又符合地方化市场的产品的策略^②。由此可知,

收稿日期:2019-09-20

作者简介:宋道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songdaolei@fudan.edu.cn)。感谢第一届“新时代文化创新论坛”专家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Ritzer G.,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Grobalization and Something/Nothing”, *Sociological Theory*, 2003 (3), pp. 193-209.

② 后来也使用其名词形式:glocalization,并做了进一步的考辨。参阅:Robertson R.,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173-174. Robertson R.,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Featherstone M., Lash, Robertson R.,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pp. 25-44.

全球地方化的最初灵感来源于跨国企业开展的对地方化市场的适应性经济变革行为。就其最常见的形式来讲,跨国企业的全球地方化策略的结果,是针对不同的地方化市场的适应性产品,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人以全球要素和地方要素相互融合的印象^①。学者从跨国企业的全球地方化的经济行为中,提炼出来的全球地方化的一般化理论内涵,使其影响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城市领域和社会领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实实践现象和理论分析概念。正是基于此,罗纳德·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将全球地方化的内涵进行了一般化理解,他认为全球化不是一种单向过程,而是“全球”与“地方”两个主体的互动过程,其“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过程”^②。他的理论判断向我们昭示,全球化不是单向的全球化吞噬地方化的过程,也不是地方化单向反抗全球化的过程,而是两者互动互融的混合过程^③。

毋庸置疑的是,当下的全球地方化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产生的具有全球化和地方化双重特征的混合现象。全球化最初是以经济现象的方式推进的,虽然“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普及程度不同,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也被纳入到全球市场的这一体系中,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曼谷、台北和墨西哥城只是它们中的几个缩影”^④。然而,正当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反全球化的地方化思潮与行动悄然而生。全球化在其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在地主体的反抗,代表地方化的在地主体在全球化的倒逼压力下,重新发现了自身的诉求,凸显了自身的特质,并将其转化为反抗全球化浪潮的在地行动。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各自强调自身独有特质的时候,在实质上两者反而都改变了自身的“纯粹性”,浸染了彼此的特质^⑤。换言之,全球化在不同的代表了地方化的民族国家的“扩张中”逐步浸润了地方化要素,地方化也在反抗全球化的行动中吸收了全球化要素,两者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全球地方化^⑥,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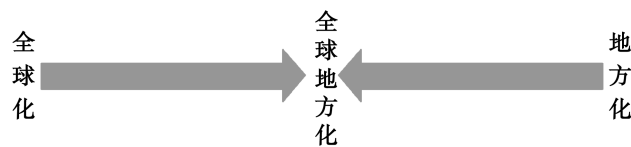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地方化的形成机制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形成机制图示中,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到全球地方化的位置。这在现代城市空间中体现的十分明显。任何国家的现代城市空间,都被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主体因循的生活经验、文化记忆等要素同时塑造着。在建构城市空间一端的是全球化代表的资本在逐利理性的指导下塑造的中产化和商品化的空间(space),它被看成是投资对象;另一端是地方化主体世代生活和居住的极具生活化和文化性的地方(place),它被看成是生活和文化的贮存器^⑦;位于中间位置的是结合了全球化的一般化特征和地方化的在地品质的、具有融合性的全球地方化的空间和地方,它被看成

① Dumitrescu L., Vinerean S., “The Glocal Strategy Of Global Brands”, *Studie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010(3), pp. 147-155.

② Robertson R.,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177-178.

③ 周利敏:“全球地域化”思想及对区域发展的意义,《人文地理》2011年第1期。

④ 萨斯基娅·萨森:《新技术的影响和城市全球化》,载理查德·T·勒盖茨等:《城市读本(中文版)》,马文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574页。

⑤ 陈彩虹:“全球地方化”: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趋势,《中国新时代》2006年第8期。

⑥ 孙启榕:《全球地方化的论述与实践:从台北社区规划师制度谈起》,《世界建筑》2009年第5期。

⑦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在段义孚看来:“空间和地方是人们熟知的表示共同经验的词语,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空间的意义经常与地方的意义交融在一起,空间比地方更加抽象,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变成我们逐渐熟识且赋予其价值的地方。”

是混合了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综合性场所^①。全球地方化，位于全球化和地方化相向而行的过程的中间位置，它意味着地方化的生活和文化叙事被全球化的力量重新营销和呈现，全球化的资本叙事被地方化的生活和文化叙事重新诠释、塑造并赋予地方意义，两者既保持了自身的独有特征，但是也拥有了彼此的一般化特征，形成了融两者于一体的混合体^②。图示中的全球地方化，具有如此完美的全球化要素和地方化要素的平衡状态，位于全球化和地方化构成的连续光谱的中间位置。但是，其在现实世界中极少存在。由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形态的全球地方化作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存在，这种理想类型作为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参照系，一般被用作分析概念而进行理论研究。

二、中国的全球地方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全球化与地方化

中国的全球地方化现象的生成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世界发达国家的全球地方化现象是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既有的城市空间中生产并推进的，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全球地方化现象是在城市化尚未启动的天然的原初城市空间中产生的；虽然不能说两者的全球地方化现象与城市化进程毫无关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与城市化进程的结合并不紧密^③。与两者不同的是，中国的全球地方化不仅与全球化浪潮有关，更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严格来讲，它是全球化、城市化和地方化三者融合的产物。在中国，全球地方化的生成不仅仅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两者互动的产物，而且两者的互动借助了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实践，才得以兴起、发展和壮大。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是全球地方化推进的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和载体，全球地方化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得以落地、推进并形成和壮大。

改革开放既是中国打开国门引进全球化力量的过程，也是中国打开城市壁垒消除低城市化现象快速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各大城市不断促使全球化和地方化要素相互融合的过程^④。全球化、城市化、地方化三者合一，成为推动中国自身发展并逐步形成中国自身的全球地方化的重要机制。它的具体机制是：代表全球化的世界现代性要素进入中国，给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大城市以竞争压力或合作机会，从而使上级权力要素的优势主导力量得以主动退让，从而更利于地方化的经济、社会，尤其是城市力量的健康培育与发展，最终在城市形成融全球化、地方化和城市化于一体的全球地方化现象^⑤。

正如库森所说的“对于生活中的大问题来说，民族国家变得太小了，对于生活中的小问题来说，民族国家变得太大了，这种变化就是全球地方化”^⑥。在全球地方化过程中，全球化要素直接在作为地方化要素重要代表的城市而非民族国家中体现，甚至民族国家也是以城市为载体与全球化力量进行互动的。在中国，全球地方化现象蕴含的全球化和地方化要素，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互动交融，并最终成形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地方化力量——中央政府代表的国家、地方政府、城市等主体——展开了与全球化力量互融互通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并最终形成兼具全球化和地方化要素的城市空间的过程。以上海与苏州为例，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两类全球地方化实践，前者承载了

① 马克·阿布瑞汉森：《城市社会学：全球导览》，宋伟轩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10页。

② Knox P. L., *Cities and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74.

③ Goodfellow T., “Urban Fortunes and Skeleton Cityscapes: Real Estate and Late Urbanization in Kigali and Addis Abab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17(5), pp. 786-803.

④ Li Z., *China's Limited Urbanization: Under Socialism and Beyond*, New York: Nova Science Inc., 2003, p. 3.

⑤ 宋道雷：《城市力量：中国城市化的政治学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5-206页。

⑥ Courchene T. J., “Glocalization,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the Australian Federation”, In Calligan B., ed., *Federalism and the economy: International, National and State issues*, Canberra: Federalism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64-117.

民族国家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较多地吸纳并转化了全球化要素,更接近全球地方化连续光谱的全球化一端;后者代表了地方政府和城市的全球地方化努力,虽然基本具备全球地方化的要件,但是更多体现为以地方化要素为主导的全球地方化形态,更接近全球地方化连续光谱的地方化一端。近代以来的上海是中国最具备全球化要素和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它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了地方化主体——中央政府代表的国家意志——是如何以上海为载体实现全球地方化的,尤其是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为将国家意志落实为城市战略,上海利用国家政策大力建设全球城市(globalcity),将自身逐渐提升为具备全球要素与地方特色的代表中国的,比其他城市更加具备全球化要素的国际大都市^①,所以,国人一般将上海视为海派(全球化)的象征。

然而,同样位于长三角地区发展迅速的苏州的案例,则说明全球化要素可以赋予以城市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更大主导权,从而给予城市保留更多地方化要素的更大空间。如果说代表中国城市形象和发展典范的全球城市(上海)的发展和治理,反映的是面对全球化冲击的中央政府的全球地方化实践,那么苏州的案例则体现了地方城市政府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虽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城市政府,两者在全球化过程面前都是地方化主体的代表。根据吴缚龙的研究,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的开发不仅体现了全球化推动的工业园模式在中国的复制,更体现了苏州政府代表的地方化要素对这种全球化模式的创造转化。新加坡基于对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理解,其在中国复制园区模式建立工业园项目的实践是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洽谈的,这使苏州市政府在园区项目的谈判中日渐处于被弱化的位置。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放权过程,地方政府和城市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为了改变弱势地位并争取地方发展的优先权,苏州市政府开始主动学习和模仿新加坡的全球化的园区开发模式,于1990年开发建设了由自身地方化要素主导的、具有全球化标准的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工业园区。这种被地方化要素主导的模仿全球化标准和典范的过程,比单一靠新加坡主导的全球化要素与中国中央政府合作的过程更加高效和成本低廉。由此形成了与更加具备全球化要素的上海相对的,更加具备地方化要素的全球地方化形态,即苏南模式^②。上述案例说明,全球化要素与地方化要素在中国的城市化实践中,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而是两种要素互动互融形成的吸纳彼此的全球地方化过程,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力量没那么均衡。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正是全球化的一般机制与中国的城市化、地方化机制融合推动而达成的,离开其中的任何一点,中国都无法创造具有全球地方化的经济腾飞和城市发展的成就。

无论是北京、上海的全球地方化的形成,还是纽约、伦敦的全球地方化的形成,它们都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的产物,只不过在中国,它明显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城市改造过程,在纽约、伦敦,它明显地表现为小尺度的城市更新与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过程^③。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等城市政府在全球城市典范带来的国际样板的激励下,以公权力的力量拆除更具地方化特色的胡同和弄堂,将生活于此的积淀了深厚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的居民,以异地拆迁的方式迁移到更加偏远的城郊地带,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却缺少生活气息和文化记忆的高层公寓和设计雄伟的摩天大楼;与此相对,利物浦和毕尔巴勒则是在拆除废弃水岸码头的同时,将工业化时代的船坞和仓库改建成可供市民驻足亲近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艺术家和中产阶级则是进驻了城市中心的旧移民区,“他们一边歌颂工人阶级酒吧和外卖的小吃摊,一边又让后者淹没在如雨后春笋般的新咖啡店和精品店,以及随之而来的品牌连锁店之中”^④。这种城市建设和发展实践,更多

① 周振华:《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261-270页。

② 吴缚龙:《超越渐进主义:中国的城市革命与崛起的城市》,《城市规划学刊》2008年第1期。

③ Lees L., Phillips M. eds., *Handbook of Gentrification Studies*,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8, pp. 14-20.

④ 莎伦·佐金:《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丘兆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地保留了地方化的城市原本的文化记忆和生活经验。中国的全球地方化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全球地方化的不同就在于此：前者与大规模的城市化紧密相连，在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发生，更突显全球化的力量；后者与小尺度的城市更新密不可分，在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城市空间中推进，更突显地方化要素。

当我们将全球地方化用作理论分析概念，并将研究触角深入到中国多样性的全球地方化实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实的城市空间中呈现出来的全球地方化现象是复杂多元的。中国的许多城市空间中的公共区域、商街、社区已经被全球地方化过程塑造：集艺术画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és）于一体的 ABC 商店街区是全球地方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具体化象征，这些“高大上”的全球地方化形象偏向全球化要素一端；而“萎缩”在“杂乱”“逼仄”“局促”城市街区胡同或里弄中的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地方化的“餐饮界连锁三巨头”——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和兰州拉面，及社区杂货店、菜市场、大排档等，虽显“落寞”和“土气”，但其物流、经营模式与全球市场息息相关，却也迸发出盎然的生命力，这些“矮矬穷”的全球地方化形象偏向地方化要素一端^①。前者的消费群体是城市中上层，后者的消费群体是社区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这两类城市空间实现盈利的阶层机制不同，发展所依靠的内在驱动力不同，但是却同样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则，具有生机与活力，是全球地方化在中国城市空间的呈现。ABC 商店虽然以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面貌出现，但是，也在努力试图吸收地方化的特质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样它才能在民族国家地域内的城市空间中求得生存并发展；在地方化的貌似传统的商业空间中虽然表面上毫无全球化痕迹可寻，但是，我们团队调研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兰州拉面后得出，其连锁形式与加盟机制毫无疑问在仿效作为全球化象征的肯德基与麦当劳的连锁加盟机制，内里却又深深地刻上了地方化的烙印。^② 由此看来，前者在努力吸纳后者，后者也在试图仿效前者，当下既无纯粹的全球化，也无纯粹的地方化，现实中存在的只是两者兼具的全球地方化形态。

三、全球地方化悖论：城市空间面临的治理和文化挑战

从最一般的理论意义上来讲，全球地方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概念，它指向全球化要素与地方化要素的互动互融的混合化过程，其中全球化要素代表着一体化逻辑，地方化要素代表差异化逻辑，双重逻辑共同构建了全球地方化的整个过程。全球化要素为了满足地方化主体的消费实践、社会互动、象征系统和文化叙事，会融入在地主体的偏好、文化和传统，但是其中的资本力量推动的一体化逻辑，只能在有限的层面实现自身的地方化转化，其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地方化的文化和生活叙事等被同质化的结果，因为全球资本主动发起并计划推进的全球地方化过程的终极目标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化收益。^③ 差异化逻辑极易被一体化逻辑所取代，这在城市空间中体现得至为明显。无论全球地方化指向全球化与地方化在何种程度上的融合，其自身蕴含的全球化要素，尤其是优势资本力量，都会对支撑地方化运作的在地主体，以及其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造成不同程度的削弱和侵蚀，其在主观意愿上能够容纳多大程度的地方化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都会受到质疑。这种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最终导致了全球地方化悖论。

一方面，全球地方化可以满足地方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化要素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全球地方化中的典型代表——ABC 类型商店集聚的城市商街为例，ABC 类型商店集聚的城市商街中开设的店面，虽然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但是，它本质上在经济方面

① 于海：《上海纪事：社会空间的视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73-118 页。

② 作者于 2018 年 7 月份在上海的调研。

③ Menon R., “Global or Glocal: The Future Course for Strategy?”, *Glob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 2014 (5), pp. 427-432.

可以满足邻里需求,在社会方面可以拉近邻里关系,在文化方面可以累积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它在发挥经济性功能的同时,也在发挥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也就是说,它按照资本的一体化逻辑运行的同时,也作为一个社交、生活和文化的存在,不断维持着差异化的世界^①。这些城市商街,因为其近社区性特征,较了解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家门口”需求;同时,还发挥邻里守望的功能,成为街坊邻居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并逐渐砌成一道排除外来风险的邻里防线^②。与更加具备全球化特征的大型超市相比,与其说这些商业空间是经济性的,还不如说是生活性、文化性与交往性的,因为它更能够满足一般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交往等代表的社会化需求。

另一方面,全球地方化又被资本驱动的空间升级进程所捆绑,在慢慢侵蚀其中的多元化地方要素。例如在美国,以纽约的奥查德街为例,日益上涨的城市商街店面租金,使“业主而非政府采取了不续租给卖便宜衣服和皮革大衣的移民店家的策略”,这些业主希望引进更多高档类型的商店租客,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不断攀升的租金令社区特色商店无法生存,并最终走向关门的境地^③。中国也概莫能外,在中国日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商品化程度和价格越来越高,由此,政府日益高端的城市规划政策和士绅化城市实践,以及业主对于房租价格上涨的需求,正在逐渐将兼具经济和社会属性的社区商店推向灭亡的境地。

总之,那些能够将店主、购物者、业主、媒体、地方政府,以及居住社区连接起来,并满足邻里需求,缔结邻里关系,发挥邻里守望功能的全球地方化城市空间,因为租金高昂或政府的“高规格规划”而相继关门倒闭。这种作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全球地方化实践的扭曲形态,却日渐成为各国奉行的典范。基于此,我们将全球地方化内含的这种体现在具体实践中的两难境地,称之为“全球地方化悖论”。

这种全球地方化悖论招致了许多研究者的批判。莎伦·佐金无疑是这些批判者中的典型代表。她将上述全球地方化悖论概括为城市空间原真性(authenticity)的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全球地方化对地方化城市特色、社区生活和文化的侵蚀。全球地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现象,从性质上区分纯粹的全球化或地方化的做法是枉然的,但是,从程度的深浅,范围的大小和势力的强弱上,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全球化与地方化力量的对比;一般而言,前者比后者更具优势。虽然,“地方商业街不仅仅是邻里社区的可见表象,它们还是城市灵魂的重要元素”^④,作为香港的地方化建筑地标并发挥全球化功能的重庆大厦,就是其典型代表^⑤。然而,“全球城市作用进程都类似,城市复兴的全球方法集合带来了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的企业主义和士绅化策略”^⑥,这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地方化浪潮,正在侵蚀着支撑地方化要素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⑦。这些基于在地化主体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是基层社会与国家、城市、社区紧密联系的个体经历、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或者我们称之为“精神所有权”^⑧。它们的消逝意味着全球地方化实践进程中,城市空间规划,土地开发建设,商业区强势拓展与居民生活空间重塑的一体化推进,这个推进过程是与全球地方化实践导致的良性日常多样性、市民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的消逝,是一个交织并进的过程。

无论是美国、日本、荷兰,还是德国、加拿大与中国,全球地方化既让全球化与地方化保持彼此的特色,同时也在促使城市、商街与社区的地方化与日常多样性的升级,但这种升级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掺杂了全球化、地方化与城市空间原真性丧失的复杂博弈,只不过日常多样性、市民生活经验和

① 于海等:《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②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7-42页。

③ 莎伦·佐金等:《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张伊娜等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④ 莎伦·佐金等:《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第24页。

⑤ 麦高登:《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杨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⑥ 莎伦·佐金等:《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第20页。

⑦ Sun X., Huang R., “Extension of State-Led Growth Coalition and Grassroots Management: A Case-Study of Shanghai”,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6(6), pp. 917-943.

⑧ 莎伦·佐金等:《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第43页。

文化记忆的生成、维持、衰退与升级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面向。在地方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流动性致使城市对投资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城市政府将企业家主义引入城市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城市发展、规划和治理给予金融和商业极大优先权,这导致代表城市原真性的生活、文化的衰退和空间的士绅化升级,即全球化力量占据优势,地方化力量在不断衰退^①。全球化力量的地方化转变,政府的城市规划实践,当地商业促进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BID)的策略,业主维持特色商店运营的努力,社区居民与社区商店的社交性互动,在生产着城市的日常多样性、市民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生产着全球地方化的排他性结构和力量^②,时时刻刻制造着承载城市灵魂的原真性空间的濒危,从而产生了全球地方化与原真性丧失的悖论。

在中国,全球地方化实践伴随着城市空间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浪潮驱动政府将一部分职能让渡给了市场,另一部分职能与超国家组织进行协作;地方化要素推动政府不断放权,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城市政府和社区^③。当下流行于政界和学术界的这种治理转型向我们昭示,全球地方化影响下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关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在不断同步加深^④。这种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深化的全球地方化,给当下的城市空间治理和文化生态带来了多重挑战。但是,我们需要清醒的是,全球地方化进程在城市空间上的呈现,必然既带来全球化的国际要素,也产生了地方化的保持自身特色的态度和行为,虽然我们主观上认为需要创造保留两者优点而摒弃两者的缺点的全球地方化的理想形态,但是,全球地方化带来的客观实践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对其理想形态的期许只能表现为道德和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往往无法阻止全球地方化实践带来的三重挑战^⑤,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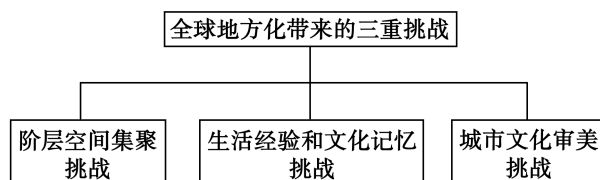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地方化带来的三重挑战

第一,阶层空间集聚挑战。全球地方化在物理空间中的演进过程并不是扁平化的,它具有显著的阶层化属性。全球地方化依靠资本的内在驱动力,透过本地政府和开发商组成的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土地进行开发,城市空间进行更新,城市社区、商街进行重塑^⑥,资本累积和空间商品化的结果带来了不平等的城市空间演化,从而导致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均衡性^⑦。这集中体现为经过重新升级改造过的城市空间,吸引了在经济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及以上群体的到来。随着他们在相对毗邻空间中的集聚和定居,他们对原来的社区居住和生活空间产生挤压效应,致使经济上相对弱势的阶层的逃离,而重新迁移到边缘化城市空间,并最终导致“这个”“核心”地区的“中产阶层化”或“士绅化”集聚,“那个”“边缘”地区的“贫穷化”“低端化”集聚^⑧。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地方化

① 马克·戈特迪纳:《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79页。

② Porto, Alberto et al., “‘Gloc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Urban Public Economics Review*, 2014(20), pp. 62-93.

③ 安德鲁·塔隆:《英国城市更新》,杨帆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6页。

④ Jones P., Evans J.,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UK*, London: Sage, 2009, p. 171.

⑤ Roudometof V., “Trans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and Glocalization”, *Current Sociology*, 2005(1), pp. 113-135.

⑥ Guo Y., Zhang C., Wang Y. P., Li X., “(De-)Activating the Growth Machine for Re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iedu Urban Village in Guangzhou”, *Urban Studies*, 2018(7), pp. 1420-1438.

⑦ McFarlane, Colin, “The City as Assemblage: Dwelling and Urban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9(29), pp. 649-671.

⑧ 尼尔·史密斯:《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李晔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7页。

在城市空间的演进不是对所有阶层都是普惠和均等的,而是天然有利于中产或中上层,而不利弱势群体所代表的下层阶层。

第二,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挑战。全球地方化在生活空间中的演进,对地方化主体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带来了极大冲击。城市虽然是陌生化和匿名性的空间,但是位于城市中的由相对熟悉的邻里组成的生活化的社区,是个体居民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生活经验、文化记忆的主要空间^①。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城市生活空间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实践”^②。然而,随着全球地方化在城市空间中的不断推进,作为承载个体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的生活空间,一方面经受着政府规划和资本逐利引起的空间成本上涨导致的个体生活和居住成本的不断升高,进而导致的生活化的就业机会的减少的代价,最终令这些世代居住生活在此的个体前往成本更加低廉的,却与原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毫无关联的边缘地区;由此,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空间的精神所有权,需要在新的城市物理空间重新累积新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③。另一方面,与政府和资本利用上述硬权力实现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的脱嵌不同,全球地方化可以借助经济上强势阶层的审美标准、话语体系和象征符号等软权力,重新定义原住民在其生活空间中形成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以强势阶层的意识形态霸权重新塑造他们对空间的主观理解,从而悄无声息地实现在空间意义上的再生产,形成全球地方化主导的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的表征”^④。虽然,这些地方化主体会对全球地方化带给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上的冲击进行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基本上是徒劳的^⑤。

第三,城市文化审美挑战。全球地方化在文化空间中的演进,带来了城市文化审美的单一化呈现。全球地方化虽然内含着对在地文化的容纳或创造性转化,但是,“最近半世纪来,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局面,与二十世纪时代的国家主义相比,今天的全球化,浸漫然要以更广阔的天下思想,来代替疆我界的国族主义”^⑥。这种文化全球化带来的超国家文化现象,已经不是纯粹的全球化实践,而是打着尊重在地文化的旗帜推进的,但是实质上推进的是“一系列美化城市市容市貌,改变城市文化空间的项目”,这些项目逐渐成为改变或重塑城市文化生态的结构性力量^⑦。这种结构性力量由三部分构成:一方是政府公权力推动的城市文化景观规划,一方是代表资本的私有企业或跨国公司对商业化空间的升级改造,一方是在士绅化城市空间集聚的中上层对消费空间和审美的迫切需求;前者追求的是物理意义上的美丽洁净的城市市容市貌,中者追求的是能吸引顾客并带来利润的商业化空间,后者追求的是符合自身阶层身份的具有“小资情调”的消费空间和文化审美标准。三者共同塑造了现在流行于国内外城市空间的,充斥着中上层审美的,千篇一律的中产化甚至更加高档化的商店承载的城市文化空间。这种融消费和文化于一体的城市空间正在不断复制和扩张,进而对周边商街文化环境和社区文化生态产生重塑效应,对多元生动的城市在地文化和原生文化生态带来了极大冲击,严重挑战着城市空间作为文化贮存器、传播者和创造者的角色^⑧。这最终导致了城市文化审美的单调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是全球地方化带来了城市单一文化审美的流行和传播,更是这种易于模仿的打上了中上层烙印的城市消费和文化空间,借助全球地方化过程形成了再生机制,实现了自我的不断复制。这与它是否促进了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

① Delanty G., *Commu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9-12.

② 孙小逸:《空间的生产与城市的权利:理论、应用及其中国意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

③ 莎伦·佐金:《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王志弘等译,香港: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 33.

⑤ 道格拉斯·梅西等:《攀登劳雷尔山:一个美国郊区围绕保障性住房的抗争及社会流动》,陈广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⑥ 许倬云:《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将何去何从》,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16/1021/442818.shtml>,访问日期:2019年7月21日。

⑦ 潘天舒:《上海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记忆、地方感与“士绅化”实践》,《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⑧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保持、提升的关联性不大,而是与中上阶层在消费和审美上的单一化空间体现紧密相关而已^①。

四、结语

全球地方化在使一些城市空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族群和日常生活多样性的同时,也在使另一些城市空间变得日益标准化、单一化和同质化。“尽管全世界每一座城市的地方机构仍然遵从着不同的叙事方式,他们通常提倡一个同质而浮华的城市幻象,把地方化和社会多样性置于危险境地”^②,全球化要素与地方化要素的互动,一方面给予原真性城市空间以更加韧性的生存力,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则以表面上看似原真性的方式,通过全球化的标准形式,实质上以同质化的方式在塑造空间、人和文化,制造着“千城一面”的城市空间。多元主体和文化要素互动的城市空间,不仅呈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空间,同时也呈现为多样化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前者的空间承载着城市治理的有形的物质要件,作为后者的空间承载着城市及其市民的无形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全球地方化带来的同质化物理空间,在经济上占优势阶层的经济力量和霸权话语主导下,不仅会同质化前者,而且会规训后者。在全球地方化的推进过程中,全球资本、国家力量、城市政府、私有企业主、中产阶层和城市个体市民,正在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却不知道未来前景如何的城市空间治理和文化形态挑战。然而,无论这场挑战如何复杂和艰巨,应对这场挑战并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的本质是明确的:保持和提升城市个体的归属感,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多样性、城市的灵魂和国家的文化自信。

Glocalization and Its Paradox: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Challenges in Urban Space

Song Daolei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 R. China)

Abstract: Glocalization is the phenomenon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China's glocalization results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based on rapid urbaniz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Gloc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has retained the elements of localization to some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bounded by capital-driven space development, as its elements of localization and pluralism slowly eroded. Broad and deep process of g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brings about the paradox of “authenticity”, which poses three challenges of urban space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lass space aggregation, the challenge of life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aesthetic sense of urban culture. In essence, to meet the challenges is to retain, maintain and enhance the individual sense of belonging, the diversity of life and culture of urban space, the soul of the ci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n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ulture; Glocalization; Urban spac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郝云飞]

① 潘姜汐熹:《你也变成了一个土绅化审美病毒的携带者吗?》,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58362.html>, 访问日期:2019年7月25日。

② 莎伦·佐金等:《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第24页。